

20世纪早期青年问题社会调查与 青年研究的科学化

■ 王 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社会调查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有利于推进问题的深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青年问题日益凸显。国内的教育学者、心理学者开始引入西方心理学的理论,进行青年问题调查。他们以问答法为主要调查方式,或发挥青年的主体性,或移植美国实践经验,运用归纳、统计等科学方法,对青年婚姻、求学、职业等重大问题进行阐释分析。以舒新城、周先庚为代表的研究者主张发挥青年主体性解决青年问题,而杨贤江则认为应先改造青年再改造社会,彻底消除青年问题。

【关键词】20世纪早期 青年问题 社会调查 青年研究 科学化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8.06.02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运动给青年群体带来的政治光环消失殆尽。那时的文学作品描绘青年精神状态时,常使用“苦闷、绝望、彷徨”等词汇,报纸杂志上经常刊载关于青年自杀、求学失业、恋爱婚姻等问题的文章,社会上所谓的“青年顾问”纷纷登场,给青年们开具各式“药方”。在众声喧嚣中,青年问题的讨论模糊了青年问题的本质和实态。与此相对,心理学、教育学家秉持科学的态度,在事实调查的基础上分析青年问题,提供了积极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类学术实践活动一直被我们所忽视。

以舒新城、杨贤江、张文昌和周先庚为代表的心理学者、教育学者,在引进介绍国外“青年期”理论的同时,普及青年期知识,通过对中国青年问题的实际调查,形成一系列解决青年问题的新方案,为青年提供指导和帮助。这些深入青年群体的调查和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成为今天了解当时青年问题的珍贵历史文本。本文拟从青年问题调查的社会背景,研究者的学术渊源、知识结构、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解读四份调查文本,检讨这些调查的科学性,以及作为历史资料的青年问题社会调查,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了青年群体遭遇的人生困境。

一、“青年”何以成为“问题”?

青年学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股新兴力量。随着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兴起,青年学生向城市集中,他们在校园内学习生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青年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他

收稿日期:2018-09-05

作者简介:王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年文化史、婚姻家庭史。

们登上社会的舞台,担负起挽救国运的历史责任,引起社会各界瞩目。同时,中学数量和 student 数量也迅速增加。1915年,全国有中学校444所,学生69770人;到了1923年,学校增加到738所,学生数量多达115548人^[1]。虽然青年群体力量崛起,个体的青年却处于迷茫和不安的情绪中。沪江大学1934级学生邹鸿操称,他在青年时代过着“幻想、苦闷、冲动、恐怖、悲观、感叹”的生活。家庭制度、国家社会的黑暗、前途未卜以及生理冲动等因素对其思想产生巨大冲击,造成他持续的失眠和精神疲乏^[2]。无独有偶,郑超麟回忆其在中学毕业后也时常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3]。青年的“烦闷、苦恼”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为常见。

同时代的研究者认为,这些“烦恼”意味着青年对社会的“不适应”。人在青年时期的身心发展具有跳跃性,对社会的责任与对爱情的向往,随着性的成熟而萌生出明确的意识。但青年既不了解社会,又不明白身体发育所引发的心理变化,常常遇到心理适应方面的问题。因而,青春期又被称为“危险时期”^[4]。这一时期,青年如果遇到特殊环境刺激,平日的生活习惯不能适应突发的困难,导致青年问题的出现^[5]。因此,研究者们从青年生理心理变化与社会环境变动两个方面探究青年问题的发生机制。

到了中学阶段,自我的观念逐渐萌生。廖世承指出“人世间可喜可忧可爱可憎的事情,渐渐地来萦绕青年的心志”^[6],由此青年问题产生。张文昌则强调,青年内心所形成的新观念、新要求、新兴趣,如“好活动、好交际、好自我表现,求知欲旺盛,同情心扩大,性欲的刺激,情的奔放”等,是导致青年问题的深层心理原因^[7]。从以上论述可知,研究者们已注意到青年期心理特征,这与20世纪早期霍尔青年期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密切相关。

青年期的发现是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产物。1904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将进化论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认为个体发展重演了人类的发展阶段。青年期(Adolescence)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在青年期后期,个体重演的是现代文明的起始阶段。因此,霍尔认为,“青年期是新生命之开始,从这时候起,有更高等、更完全的人性产生出来”^[8]。1908年霍尔将原著《青年期》一书的精华部分摘出,新增一章“道德和宗教的教育”,出版了《青年期:教育、养成与健康》(Youth: Its Education, Regimen and Hygiene)一书。随着“青年期”概念引入中国,“青年问题”从一种讨论话题变为科学研究对象,可以说,在“青年期”概念传入之前,中国人并不清楚有所谓青年问题,更谈不上研究了^[9]。1922年,杨贤江在《学生杂志》发表了《第二诞生期:人生第二危险期》一文,介绍霍尔理论的核心观点,阐明了何谓第二诞生期。1929年,杨贤江以“李浩吾”为笔名,翻译出版中译本《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因原著文字晦涩,且是删节版,杨贤江翻译时遇到许多困难。所以,他参照了和田琳熊翻译的日文版。从引证文献来看,国内研究者关于青年生理、心理特征的论述,明显受到霍尔青年期理论的启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的赵廷为在《青年期的研究》一文中介绍国外青年期研究的概况,多处引用霍尔的观点^[10]。杨贤江撰写文章《中等教育与青年问题》时,借鉴了霍尔关于青年期的年龄划分。廖世承则为了论证性欲和青年心理的关系,运用了霍尔的观点归纳青年期特征。可见,霍尔的学说深刻影响了国内青年期研究,引导国内学者从青年期心理和行为特征的角度来阐释和分析青年问题。

国内知识界也认识到了霍尔学说解释青年问题的局限性,青年的“不适应”情绪,不仅仅是青春期心理和生理变化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1938年,吴泽霖翻译E. B. 伦特(E. B. Renter)的《社会学观点下的青春期》(The Sociology of Adolescence)。E. B. 伦特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造成了青年面对相互矛盾的“各类社会标准”时无所适从^[11]。此时,国内学者也发现了社会环境与青年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张文昌将“青年问题”归结为社会环境刺激下的行为^[12]。杨贤江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进一步提出“何以中国青年从前不发生过问

题?”他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青年生活在被压制的环境里。20世纪前的青年认同传统社会道德,因而在社会标准适应方面没有明显的矛盾和冲突,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影响了青年生活。(1)辛亥革命前后,青年加入革命党,组织学生军,青年群体气势浩大。政治偶像推翻以后,剪发、废除旧历,青年自身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2)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制度,推广白话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知识阶级觉醒了。(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和五四运动爆发,引起全国学生空前的活跃,从此,青年好动、革新的特点完全显露出来^[13]。

从社会变动的角度来理解青年问题,可以超越青年个体的限制,把普遍存在的青年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期,强调的是青年个体对于社会的适应性,既包括青年期的成长变化,又有社会结构变动的因素;青年群体的社会不适应性,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须从社会结构中寻求解释。传统中国社会的变化是缓慢的,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出现显著的不适应,而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致使青年问题凸显出来,引起学界和舆论的普遍关注。

二、青年问题调查的发端

民国知识界虽然关注和讨论青年问题,但并不存在致力于青年问题社会调查的学术共同体。20世纪早期的青年问题调查是教育学、心理学研究者自发的、以发现和解决青年问题为导向的学术实践活动。基于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反思,教师有意识地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在青年时期遭遇的人生困境,形成有针对性的改良意见。

舒新城是较早进行青年问题调查实践的教育者。1923年,舒新城向学校申请设立青年修养课程。他始终认为,自己接触的青年问题都是片段的,希望借助课堂教学将青年问题研究清楚。于是在青年修养课上,他把平时思考的问题分类,交由学生们讨论并补充意见,这些学生基本上是15-20岁的青年^[14]。以青年身体方面的问题为例,舒新城将一百三十余名青年的意见汇总,归纳出12个具体问题。他原计划把问题逐条列出来,请更多的青年回答,后因时间不足而未能实行。因此,他认为报告只能反映青年问题的性质,无法确定青年群体存在上述问题的具体数量。他从青年反馈的意见推测,当时的大多数青年身体是不健康的。舒新城对青年问题的初步总结和归纳,为后继研究者的调查奠定了基础。根据舒新城的调查结果,廖世承在《中学教育》一书中,将青年问题分成家庭、经济、身体、交友、学业、行为、性情及思想等7大类。作为师范学校教科书的《中学教育》影响甚广,后继的调查者杨贤江、张友仁、张文昌等都引述了廖世承对于青年问题的分类,从不同角度细化了舒新城的研究。

杨贤江不仅将霍尔“青年期”的理论译介到中国,并且非常关注现实的青年问题。1923年,他发起成立“青年问题讨论会”,以讨论“青年的学术上、人生上和其他切要问题”为宗旨,譬如求学、婚姻、服务社会、干预政治、选择职业、独立生活等。“青年问题研究会”用通信方式讨论青年问题,并汇总成篇,作为该会正式意见刊发在《学生杂志》上^[15]。1924年8月,杨贤江在上海夏令讲学会发表青年问题的讲演中,将青年问题的分类增加了一项婚姻问题,总体上借鉴了舒新城的研究^[16]。由此,杨贤江对中国青年问题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

杨贤江认为,中国青年问题的种类与内容远比舒新城等人的调查要复杂。他的调查对象遍及全国各地,大多数是中等学校临近毕业的学生。他把青年问题划分为11类:生理、家庭、社交、求学、婚姻、职业、经济、生活态度、人生观、政治见解以及常识问题^[17]。杨贤江的分类新增加了职业问题、政治见解和常识问题。政治见解和常识问题多涉及政治和社会改革,如革命、主

义、学生运动、共和政体等。虽然询问职业问题的人数不多,但考虑学生毕业后面临职业选择,杨还是将其列出,以引起青年重视。由于案例丰富多样,他在阐释青年问题时充分运用了举例法,即在每个分类后面列举了一些具体问题。对于青年颇为关心的求学和婚姻问题,杨贤江还作出补充说明。他掌握的个案数量尚不得而知,但他的调查范围广泛,调查者自愿参与调查,所以调查案例相对可靠、真实。

舒新城和杨贤江完成了对中国青年问题的分类,对于婚姻、求学、职业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但因缺乏相关数量统计,无法从量的方面说明各个问题的轻重程度。而另外一份“中学学生的问题”调查,由1924年东南大学学生张友仁设计,利用简单的统计方法,从侧面证明困扰青年的三大问题是婚姻、求学和职业。张友仁制作了1000份问卷,寄给5所中等学校的同学填写,最终共收回了453份问卷^[18]。从张友仁的调查来看,其问题是开放式的,难以形成集中性的答案。而根据他的统计结果,婚姻、职业、求学构成全部的问题类型,没有“其他”的分类项。据此笔者推测,要么是数据计算未必精确,要么青年学生一致认同人生的重要问题只有这三种类型。这与杨贤江根据全国青年调查做出的判断一致。因此,张友仁撰文重点讨论了青年婚姻问题。从现有资料看,20世纪早期关于青年学生的婚姻调查,有学术价值的共8篇:陈鹤琴《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葛家栋《燕大男生对于婚姻态度之调查》、梁议生《燕京大学60女生之婚姻调查》、楼兆馥《婚姻调查》、甘南引《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陈利兰《中国女子对于婚姻的态度之研究》、江文汉等《学生婚姻问题》、孙本文《大学生婚姻调查报告》等。这些调查内容和结果,亦可说明婚姻问题是当时青年人普遍关切和困惑的人生问题。

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问题调查是在青年期理论的指导下、依据青年学生的反馈意见形成的调查结果。这些调查也反映了青年学生对于自身问题的思考。从调查方法来看,研究者们使用了问答法,且被调查者自愿参与,所以采集的数据相对可靠。

三、青年问题调查的科学化

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和杨贤江关于青年问题的讨论影响了后继的研究者。1935年,时任之江文理学院教育学系教员的张文昌提出青年问题具有时代性与地方性的观点。他认为,20年代进行的青年问题调查不能代表30年代青年的实际情形。而教育者应经常调查青年,要让青年说话,才能找出真正的青年问题。

张文昌的调查开始于1935年5月。选择调查对象时,他充分考虑到年龄分布和男女生的性别比例。调查对象只限于高中学生,年龄范围大致为15-20岁。张文昌没有把初中生纳入调查对象,一是因为人数太多,不易统计,二是因初中生年龄较小,多数未到青春期,严格地说不能算作青年。调查的学校共有5所,被调查者共计577人,其中男生457人,女生120人,女生约占总数五分之一^[19]。张文昌先将调查对象依据实际年龄分组,再按照性别进行二次分组,少数15岁以下者并入第一组,少数20岁以上者并入第二组。调查内容包括青年健康、习惯、学业、经济、社交、家庭、政治、人生8个方面,问题的类型既有是非题,又有填空题,共149个问题。调查结果是依据年龄和性别统计每个题目的人数与百分比。为了使结果更精确,以每题实际回答的人数为标准计算百分数。报告因篇幅关系,并没有列出年龄组的情况,只显示性别组的统计以及综合统计的情况^[20]。张文昌的调查结果显示了存在各类问题的青年数量,以及每种问题在男女青年中的差异表现,反映出杭州市青年人的一般生活状况。

同一时期,清华大学教授周先庚利用心理学测验方法进行了学生烦恼调查。周先庚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接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技术训练。他批评国内“随意造问题,邮寄

分发给他人填答”的“问答法滥用”现象,既不考虑调查事实是否适用于问答法,又不参考理论书籍编制问卷。他推荐的是1930年芝加哥大学统计测验心理学家叟斯通(Thurstone)的情感问题调查,认为它很适合大规模团体调查,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测验多数人的情况,是科学、客观、迅速、可靠的方法^[21]。周先庚把叟斯通“情感问题调查单”的223个问题,一字未改翻译成中文,制成“学生烦恼调查”问卷。他也注意到,基于美国经验事实的某些问题不符合中国社会情形,但为了比较中美学生心理适应状况的差异,就暂以美国社会标准来测验中国同等程度的学生,然后再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弄清哪些问题代表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后再逐条修改,为中国学生量身定做适合的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第一页印有填写说明,希望受测验者了解调查目的,如实填写。同时向他们普及一些心理卫生知识,懂得采取积极的态度面对不良心理,或向专家寻求指导。填写说明中多次提到保护受验者的隐私,使他们抛弃顾虑,如实回答问题^[22]。

周先庚整理问卷的方法也非常高效。他把问题进行顺序编号,将每个问题的3个答案选项(即“是”“否”与“?”其中,“?”表示不知道)逐项印在问题的前面。同时设计长8寸、宽0.75寸的硬纸条,按照每页问题正确答案的位置,凿出许多圆孔,计算答案时,把含有答案孔洞的纸条叠放在每页的问题答案上,计算孔洞中所填答案的数量^[23]。

周先庚的测评结果显示:中国青年学生的烦恼比美国学生多。调查中855人的平均烦恼程度不但比美国1217个正常人的平均程度高,而且比美国138位女罪犯和82位神经病患者还高得多。按照叟斯通的烦恼程度等级的划分,中国“情感生活适应最良”的学生比例还不到1%,“应请神经病学家诊治”的学生比例占37.5%,还有2.2%的学生竟有140-189条烦恼,甚至超过了叟斯通设定的最高等级,周先庚认为这些学生应该寻求专业诊断和治疗^[24]。

20世纪30年代,青年问题调查的特点是依照科学分类进行数据采集,并应用现代统计方法进行数据整理。值得注意的是,张文昌和周先庚这两位研究者分别采取基于本土经验的问答法和美国实验心理学的测评方法,算出学生烦恼的数据,张文昌的调查显示,学生感觉烦恼的比例为35.5%,而周文昌的测验结果显示37.5%的学生情感生活适应最不良。两份调查结果证实了文字描述呈现的当时青年苦闷和烦恼的精神状态。

四、青年问题的解决方案:两种模式

综观20世纪早期的中国青年问题调查,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青年问题源于青年对社会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一是因为青年期生理和心理的发展,二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剧变。这些调查的主旨是帮助和指导青年度过人生发展的特殊时期。虽然调查者都以发现、解决青年问题为目的,但是不同的改善措施折射出其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第一种解决方案以培养青年自觉和独立人格为目标。舒新城认为,青年问题应从教育者和青年两方面进行改良。以青年健康为例,青年指导者应适当调整课程设置和训育方法,调整的标准以适应于青年为宜。青年需有自己的觉悟,认识到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努力拥有健康的身体。这些建议强调教育应适合青年的需要,充分发挥青年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恰好印证了舒新城的教育理念“教育是改进人生的活动”,其目的是“为社会创造独立的个人,为个人创造互助的社会”,“使受教育者能自动解决问题,创造生活”^[25]。因此,舒新城教育青年,并非以改造青年为目的,而是为了培养青年自身的主体性。

同样,周先庚呼吁重视青年的人格教育。鉴于中国学生烦恼程度较高、精神疾患严重的状况,周先庚认为,中国应实行现代教育,除了提供正确的知识外,还应对学生的行为、道德、品性

和人格负有责任。中国学校也应仿照国外制度,开展心理卫生工作:(1)学校应有德育、群育指导,并设置心理卫生的课程和讲座;(2)成立学生职业指导部门,请心理学家或顾问进行心理卫生的咨询与治疗等^[26]。制度方面的推进,虽然存在困难,但作为心理学教授,周先庚身体力行,经常在清华大学发表心理学演讲,并表示愿意随时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后来,他在西南联大与几位教授一起成立青年问题顾问处,为青年学生提供心理、信仰、家庭、婚姻等咨询和帮助^[27]。

第二种解决方案从社会改造的角度解决青年问题。杨贤江认为,在帮助青年解决个体性问题的同时,还应以社会改造来解决青年的普遍性问题。如生理、婚姻问题可通过学习知识自行解决;然而,全社会青年的求学问题、经济问题等无法逐一解决。曾有一名青年写信向杨贤江求助,他因经济困窘而投考师范学校,正逢军阀战争教育经费被挪作军饷,而不得不典当负债……^[28]杨贤江认为,这类青年问题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只能诉诸改造社会的运动。譬如办平民学校,“劝告年长失学者或他们的子女来入学”;向农工宣传,“引起他们的注意,使他们能接受宣传者的意思”“组织群众,指挥群众,使这个运动能发生效果”^[29]。

杨贤江认为,社会改造运动是青年群体的责任,需通过宣传和动员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在《中国青年之敌》一文中,他对青年问题的阐释生发出新的认识社会的方法论,他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工具来解释青年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青年求学就业、恋爱结婚的最大阻碍。青年人要反抗资本主义,必须明白社会演化的规律,即“革命”和“阶级斗争历史”,要援助“被压迫阶级”,“不能再为压迫阶级张目作恶”^[30]了。杨贤江认为,资本主义导致青年问题的发生,要解决青年问题,就应该改造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青年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员对象。

杨贤江对于青年问题的分析有两大理论来源:一是霍尔的青年期理论,二是唯物主义。前者将进化论引入到人的成长阶段,后者则强调社会进化的规律,二者是进化论在不同研究命题上的应用,共同构成杨贤江阐释青年问题的理论基础。最终,杨贤江提出了“全人生指导”的教育观点,即教育者对于青年的所有问题都应负有指导责任,认为中学学校教育应从九个方面进行改良:“1. 确定中等教育及训育的方针,以指导青年期的心身发展;2. 莫要采取反动与专制的教育,以酿成学潮;3. 性教育实不可缺少;4. 应由卫生和健康法的指导;5. 培养学生自学之能力;6. 注意时事教育及政治训练;7. 实行教育及职业指导;8. 注重团体生活的训练;9. 指导学生进行社会改造运动。”^[31]杨贤江建议既关切到青年期发展的特殊性,又指明学生参加社会改造运动的必要性。青年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进化是有机统一的,因此,要解决青年问题,必须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必须由青年来完成。

五、结 语

20世纪20年代,随着霍尔青春期理论的传入,中国知识界深刻认识到青年问题的重要性,青年问题调查随之兴起。这一时期,中国青年问题调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学术脉络。首先是以舒新城、杨贤江、张文昌为代表的,从青年实际生活入手,发现“中国真正青年问题”的研究者。三位研究者均是师范学校毕业,开展调查前虽未接受过现代调查统计训练,却有着丰富教育实践经验。他们通过与学生的交流互动研究青年问题。舒新城和杨贤江采用问答的形式进行调查,在听取青年人意见的基础上加以归纳和总结。舒新城的青年修养课程、杨贤江编辑的《学生杂志》通讯以及青年问题讨论会,为他们的调查提供了丰富的真实案例。可以说,舒新城和杨贤江的调查是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调动青年学生积极参与,是一种以青年为主体的调查方

式。这种调查风格以及问题设计反映了时代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舒新城和杨贤江的调查只在问题举例和类型划分方面不断重组和增补,并未采用现代统计方法,致使青年问题的分布和普遍性无法被清晰说明。张文昌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他细化了舒、杨二人的研究,认识到“青年问题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和时代性”,选择杭州的5所高中作为调查对象,并对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组,逐个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基于数据整理方法的变化,张的统计结果呈现出青年问题的多种面向,丰富了知识界对青年问题的认知。青年的特殊心理问题如自杀倾向在男女学生群体中的比例分布,以及学生对中日亲善的态度,也由原来的“模糊化”“印象化”而日渐“清晰化”“科学化”。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路径不同,周先庚使用的是国外实验心理学测验的方法。他对问卷调查秉持严谨的态度,在调查中国学生烦恼程度时,全面移植了美国心理学界最具权威性的情感生活调查问卷。他也认识到,这份情感生活调查问卷中存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问题,所以先以美国问卷为标准,通过对比发现中国青年的特殊情感问题,再设计专门针对中国青年的情感调查问卷。

20世纪早期的青年问题调查是运用科学理论方法进行的研究实践,推动和引领了中国青年研究的本土化和科学化,对于当今我们研究、调查青年问题仍有许多启发和借鉴意义。(1)信息技术时代,问卷调查更加高效便捷,今天的研究者强调问题的设计,而易忽视调查过程中人的因素。相反,早期研究者如舒新城、张文昌认为,要让青年“说话”,重视与青年人的交流互动,试图站在青年的立场上理解青年问题。他们采取以青年为主体的调查方式,能够拉近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情感距离,有利于深入到青年本体层面解决青年问题。(2)这些研究报告承载着研究者们的本土关怀和现实关照。中国青年问题的研究既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也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正的青年问题。在这方面,杨贤江作出了良好的示范。同时,我们也应借鉴周先庚的思考方式,拥有国际比较的视野,将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问题进行对比研究,如此,才能多角度、立体化地理解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青年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 [2]邹鸿操《青年期的心理卫生》,载《南大教育》,1935年第2期。
- [3]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 [4]杨贤江《第二诞生期:人生第二危险期》,载《学生杂志》,1922年第3期。
- [5][7][12][19][20]张文昌《青年问题研究——杭市五百七十七名高中学生调查表统计结果》,载《教育杂志》,1936年第1期。
- [6]廖世承《中学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33页。
- [8]斯坦利·霍尔《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杨贤江译,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8页。
- [9][18]张友仁《青年与婚姻问题》,载《学生杂志》,1924年第1期。
- [10]赵廷为《青年期的研究》,载《民铎杂志》,1924年第4期。
- [11]吴泽霖《社会学观点下的青春期》,载《东方杂志》,1938年第16期。
- [13][16][17][28][29][31]杨贤江《中等教育与青年问题》,载《教育杂志》,1925年第9期。
- [14]舒新城《青年及青年所急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一)》,载《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1期。
- [15]杨贤江《青年问题讨论会简章》,载《学生杂志》,1923年第1期。
- [21][22][23][24][26]周先庚《学生“烦恼”与“心理卫生”》,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第2期。
- [25]舒新城《教育通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页。
- [27]阎书昌、周广业《周先庚文集》(卷2),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 [30]杨贤江《中国青年之敌》,载《民铎杂志》,1924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俊华)